

熊十力全集

【附卷(下)】

◎湖北教育出版社

紀念熊十力先生誕生一百周年

學術討論會開幕詞

蕭萇父

同志們、朋友們：

紀念熊十力先生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現在在熊先生的故鄉——山明水秀的黃州開幕了。

這次會，是由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湖北省政協學委、黃岡地委行署和黃岡縣政府共同發起的。在籌備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全國政協、湖北省政府的關懷指導，得到了海內外許多學者和熊先生的親故、家屬的熱情支持；中華書局爲此趕印出了新校點的《熊十力論著集》第一卷，黃岡地方各界爲我們這次會議提供了各方面的優越條件，使這次會得以順利開成。

今天參加會的，除我省各界代表外，有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賈亦斌先生，有湖北省政協副主席、中共湖北省委統戰部部長陶陽同志，還有來自全國十一個省、市、自治區的專家學者，熊老的友好、學

生和親屬共一百五十餘人。好幾位海外學者：加拿大馬克馬斯特大學冉雲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夏威夷大學成中英教授、澳大利亞麥克里大學姜允明教授，他們為參加這次紀念活動，不顧風雪嚴寒、不遠萬里歸來，並提供了重要科研成果。還有幾位在我國訪問的學者：蘇聯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布羅夫高級研究員、日本東京學習院大學坂元弘子講師等都聞風欣來與會。國內外還有許多學者：張申府、侯外廬、陳榮捷、馮友蘭、賀麟、張岱年、任繼愈、馮契、楊玉清、朱惠清、劉述先、王森、韓鏡清、虞愚、田光烈等等，由於年老或有事不能來與會，但他們都寄來了認真撰寫的論文、回憶錄和熱情洋溢的賀信、賀電及詩篇。現在，請允許我代表籌辦單位，向他們表示衷心感謝！向所有與會的老師、同志、朋友們表示熱烈歡迎！

熊十力先生生於清末光緒十一年即一八八五年（甲午戰爭前十年），卒於一九六八年（新中國成立後廿年），享年八十四歲。今年，是他誕生一百周年。回顧他生活於其中的這一百年，正是我們民族經歷着深重苦難，在苦難中覺醒奮起，在奮起鬥爭中屢遭挫折，又不斷克服艱難險阻而贏得進步和解放；同時，在文化領域，中西古今各種思潮的匯合激蕩，也空前劇烈。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誕生了熊十力先生這樣杰出的愛國思想家，培育出熊十力哲學這樣獨特的辯證思維體系。這是我們民族的哲學智慧在艱苦歷程中的升華，是

我國近現代哲學文化遺產中的珍品。

熊先生是很早奮起參加武昌首義的辛亥革命老人。我們懷着深深的敬意來紀念他，就在於他是一位赤忱的愛國者和堅貞的民主革命戰士。他少年時期，就立志救國，慷慨從戎，在湖北新軍中組織秘密社團，奔走於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辛亥之後，他又參加了護法之役，親見洪憲改元、張勳復辟、民主革命成果被封建軍閥所篡奪，“憂時之思深，憤世之情急”。如他自述：“吾年十六七便以革命從戎，狂野不學，三十左右，因奔走西南，念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又目擊萬里朱殷，時或獨自登高，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¹⁾他以這樣深摯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棄政從學，轉入學術理論的鑽研。這一轉向的內在動力，絕非消極逃世，而是一種高度自覺的歷史責任感所產生的獻身精神。如他晚年追述：“余傷清季革命失敗，又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國哲學思想，欲明了過去群俗，認清中國何由停滯不進。故余研古學，用心深細，不敢苟且。”⁽²⁾熊先生作為辛亥革命失敗的痛苦中覺醒的一員，他深研古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嚴肅的歷史反思。如他所說，“用心深細，不敢苟且”，而且目的的十分明確，就在於弄清“中國何由停滯不進”。他主要從兩方面着眼：一方面着眼於對中國封建傳統遺毒的清理，這方面他的觀察敏銳，愛憎分明。認定“兩千年專制之毒”，乃至《儒林外史》中所揭露的“一切人及我身之千醜百怪”，都需要大力清除；又指出“漢宋群儒，

其遺毒甚深，直令夏族萎靡莫振”^[3]，尤其是歷代統治者標榜的所謂“以孝治天下”以及“移孝作忠”等宗法倫理政治信條，“支持帝制，奴化斯民”，更必須徹底清算；解放後，仍反復叮嚀：“吾國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4]另一方面，區別於一般無視傳統，菲薄固有的西化論者，熊先生又深刻總結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在於“清季革命思潮自外方輸入，自己沒有根芽”^[5]，即是說，民主主義革命的理想在中國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軟弱，文化上落後而缺乏應有的根基和思想土壤。因而，他上下求索，試圖在傳統文化中去“掘發其固有之寶藏”，竭力為他心目中的民主革命理想——諸如反對神權，否定帝制，“樹立人極”，“宏大人道”，“蕩平階級”，“實行民主”，“同於大公”，“協於至平”等等，找到自己民族傳統中的“根芽”，賦予它們以富有歷史感的民族文化形式，借用古代的語言和傳統思維形式來表達新的時代思潮。他對《周易》、《春秋》、《周禮》及《禮運》等儒經的獨特解釋以及對歷代政治學術的評論，幾乎全是圍繞民主革命和自由平等社會理想的設計這一主題。他採取這種“引古籌今”、“六經注我”的方式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實際是對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蒙昧主義的尖銳批判，是對東方近代化的價值理想的執着追求，力圖使外方輸入的“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民主革命理論得到系統地中國化，從而對先天不足的辛亥革命進行理論補課。這是跳動在熊先生評史說經著作中的反映時代

精神的思想脈搏。正因為如此，他一生堅持的反帝愛國民主思想，他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講學著作活動，受到我黨和我國人民的極大尊重。他和董必武、周恩來、陳毅、郭沫若等的長期交往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陳毅稱他為“我黨之諍友”，董老一九六五年給他的信中概括說：“兄治哲學背景，不僅弟理解，吾黨之士亦多能理解也。”從《體用論》、《明心篇》、《讀經示要》、《原儒》到《乾坤衍》，作為熊先生在新中國“心地坦然，神思弗亂”的“衰年定論”^[6]，究其學術傾向，究竟是尊孔崇儒，還是托孔貶儒，見仁見智，自可爭論。但無可懷疑的是，貫注於其中的心聲，乃是熊先生對民主主義革命理想的忠貞，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愛，並且自強不息，與時偕行，對人類前途充滿信心。細讀熊先生書，無不有此感受，這是最值得我們珍視和發揚的。

熊先生是“五四”以後卓然自立而蜚聲四海的哲學家。我們懷着深深的敬意來紀念他，就在於他的學術創造，融會百家，敢破敢立，在中國和世界文化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他生當二十世紀前半葉風雨如磐的半殖民地舊中國，西化浪潮、復古逆流，相反相因，交相激蕩，使不少人迷惘不知所歸。熊先生這時進入學界，沒有隨波逐流，而是以異乎尋常的苦學精思，自循中國哲學啓蒙的特殊道路，自覺地把王陽明、王船山（被他稱作“二王之學”）視為自己的思想先驅，另闢一條推陳出新、自創體系的哲學思維途徑。一般論者把熊先生的學

術路綫歸結爲：先由儒轉佛，出入空有二宗，旋又由佛反孔而歸宗大易。這也言之有據。但熊先生治學立言的根本特點，不在學脈數變，而在於自有主宰。他所強調的“反求自識”、“反己自悟”，除認識論上的特殊涵義外，旨在治學精神上不囿成說，力破門戶，決不暖暖姝姝於一家之言，而主張博採兼綜，“以平等心究觀古今各大學派”，“析其異而觀其通，捨其短而融其長”^[7]。因而與當時崇洋論者和復古論者都異其趣，且與拉雜比附而浪言融通者亦有所不同。熊先生嘗謙遜地自省現代科學知識不足，西方哲學瞭解不多，但就其博涉所及，確能以較高層次的哲學思路，貫通古今，平章華梵，衡論中西，出入於儒、佛、老、莊及宋明諸子，其以“新唯識”或“體用論”之名所自創的獨特的哲學體系，有人稱之爲“新儒家”，又有人稱之爲“新佛家”，還有人稱之爲“新法相宗”、“新陸王學”、“新易學”等，其實，作爲真正哲人，自當熔鑄豐富的先行思想資料，故其論著中，逐處遮破佛法、睥睨西學，痛斥奴儒；且明確自稱：“吾惟以真理爲歸，本不拘家派……然吾畢竟遊乎佛與儒之間，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祇是吾而已矣。”^[8]這就難於以某種固有的學派範式去以偏概全地加以評定。熊先生的哲學思想，雖經緯萬端，而系統嚴整，大體說，以“體用不二”、“翕闢成變”、“反己自悟”，“德夢知識並重”、“內聖外王一貫”爲其綱宗，尊生主動，自強不息，高揚認識論和價值論中的主體能動原則和“不爲物化”的

“人道之尊”。不僅在“五四”以後的中國哲學論壇上獨樹一幟，自成一家之言，而且以其所達到的近代思維水平而又保持了“東方哲學的骨髓與形貌”，得以蜚聲海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熊先生哲學有其不可避免的理論上的固有矛盾和時代局限，但其龐大體系中所包含的積極成果和真理顆粒，對我國近現代哲學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一份有待我們去認真研究、消化的珍貴的思想遺產。

熊先生一生安貧樂道，勤於著述，共寫出專著二十餘種，發表論文、札記等一百餘篇，與人論學書簡更不計其數，留給我們的學術遺產是極為豐富的，除自成體系的哲學以外，尚有經學、史學、子學、佛學以及文學等多方面的學術成果。過去對熊先生學術思想的全面研究是不夠的。由於“左”道足以亂真、學派偏見作祟，以致流行過一些璞鼠相淆的錯誤評斷。近幾年，在黨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指引下，撥亂反正，情況大有改變。僅就這次會說，我們已收到兩方面內容的成果計達六十篇，一方面是回憶性文字，許多師友真切地記述了與熊先生交往、論學的親切對話，對於瞭解熊先生的精神風貌、高尚品德和篤實學風，是極為寶貴的直接史料。另一方面是研究性論著，有專著，有論文，有譯文，這樣集中地對熊先生的學術成就特別是哲學創造進行多層面的探討，海內外學者歡聚一堂、自由議論，確實是空前盛舉；尤其可喜的是，不少青年作者提供了有

一定學術質量的研究成果。通過這次紀念性的學術活動，我們相信，在海內外學者協作推動下，關於熊十力學術思想的研究，將被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

這次紀念熊十力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是緊接着北京紀念金岳霖先生的學術討論會召開的。這並非偶然，而是表明時代已經提出了一個課題，即“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像金岳霖、熊十力先生這樣自成體系而又各具特點、各有專精的哲學家，關於他們的學術創造對我國哲學文化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應當怎樣作出科學的評價？他們的哲學與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三四十年代並起的諸家哲學處於何種關係？應當怎樣如實地揭示“五四”以來中國哲學發展的客觀邏輯？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至於熊先生哲學的體系結構、思想淵源及其在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的地位、作用等，聯繫上述問題，希望在會內會外自由討論，互相切磋。

熊先生一貫主張學貴融通，認為“世間各種思想、各種學說，參稽互校，觸類引伸，經驗愈豐，神思愈啓，於是而新理發見焉”^[9]。一貫強調“夏蟲井蛙，學者宜戒！”^[10]我想，紀念熊先生的學術討論會，無疑地應當發揚熊先生一生追求的“去門戶而尚宏通”的精神，堅持思想解放路綫，實踐百家爭鳴方針，尊重“一偏之見”，樂聞“相反之論”，我們的會議進程的本身就應當體現出真理發展的辯證法。

我們這次會在當年蘇東坡貶居地赤壁召開，當時蘇東坡與一兩個客人夜遊赤壁，也討論了有關宇宙、人生的哲學問題，討論了“自其變者而觀之”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變化觀問題以及“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的認識論問題，結果兩篇《赤壁賦》傳誦至今。我們將以三天時間論討更廣大的哲學問題，這次會也必將有一本紀念文集傳之後世。

祝會議圓滿成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黃州

注 釋

- [1] 《十力語要》，卷三，《尊聞錄》，附錄。
[2] [3] 《乾坤行》，卷上。
[4] 《與劉寄窗論學書簡》。
[5] 《原儒》，上。
[6] 《乾坤行》，卷下。
[7] [10] 《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末附錄。
[8] 《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中。
[9] 《讀經示要》。

(原載《玄圃論學集》，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〇年二月版。)

紀念熊十力先生誕生一百 周年學術討論會閉幕詞

湯一介

同志們、朋友們：

我們紀念熊先生的學術討論會，開了四天，許多同志和海外朋友作了很好的發言，對熊十力先生在近現代中國哲學史上的貢獻作了充分的肯定，並具體地分析了熊先生哲學思想產生的文化背景、思想淵源及其客觀的歷史作用，這樣對我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一步研究中國近現代哲學的發展，有着重要的積極意義。

熊十力先生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學問涉及經學、佛學、子學、史學等等，當然他在哲學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我想，其中有一點很值得我們重視，即他能把外來文化思想，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中而創造出新的哲學體系。我們大家都知道，印度佛教的唯識學經過玄奘大師和他的弟子窺基等的提倡，在唐初也祇流行了三十餘年，以後就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影響。這

是爲什麼呢？從根本上說，唯識學是道地的印度文化，是印度的思維方式，太印度化了。玄奘大師等沒有能使它和中國傳統文化很好結合起來，沒有能使唯識學中國化。而在唐朝發展起來的華嚴宗和禪宗，特別是禪宗確乎完全成了中國化的佛學，因而它的流傳的時間就比較長，影響也比較大。到十九世紀末，唯識學又開始流行，從楊文會開始，後來南方有歐陽竟無先生，北方有韓清靜先生，他們都講唯識學，這些大師的學問都是很高的，對唯識學了解也很深透，可是對中國現代哲學並沒發生太大影響，爲什麼呢？我想原因之一也是因爲他們講的唯識學仍然太印度化了。可是熊十力先生不同，他先深研唯識學，而後又走出唯識學，回到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並發展了中國哲學，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思想確實受了唯識學的影響，但又不限於唯識學說；我們也可以說他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繼承，但又在不少方面突破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局限，特別是爲中國哲學增加了新的內容，即一種特殊的認識論的模式，從而補上了中國傳統哲學在認識理論方面的不足。爲什麼會這樣呢？從根本上說，當然是因爲熊十力先生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復興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同時，不能不看到熊十力先生的哲學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唯識學中國化，這一點是唐朝以來的佛教大師沒有能作到，而熊先生作到了。所以他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能說與此無關。從這裏，我

們是否可以這樣說，要發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一方面要敢於吸收外來思想文化以補充自己思想文化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使外來文化與原有文化相結合，使原有文化得到發展。

今天，我們又面臨一個外來思想文化傳入的時代，中國文化必定會有一個大發展。怎樣來發展中國思想文化呢？我想，也許有三個相互聯繫的問題要我們考慮：第一個是怎樣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相結合，以便建成和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第二個是我們當前也面臨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挑戰，我們如何吸收西方現代哲學和現代科學的新成果，來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三個是如何對我們的傳統思想文化進行深刻的歷史反思，以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自己。可以說，我們面臨的問題比熊十力先生那時所面臨的問題更為複雜，我們必須有更大的理論上的勇氣來面對這些問題，從而使我們能不愧對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

同志們、朋友們，現在可以說是幾十年來發展我國學術文化的最好時刻，我們能舉行這樣的紀念性的學術討論會，能在會上講各自不同的學術觀點，能和海外的朋友們一起共同討論，互相切磋，這不能不說是非常好的事情。學術文化必須在自由的討論中發展，這正是我們黨的百家爭鳴的方針的體現。由於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掌握大大前進了，克服了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對馬

克思主義是一開放性的思想體系有了較深刻的認識，在這樣的條件下來研究中國思想、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來研究熊十力先生的獨特哲學體系，當然是很有利的，是會取得豐碩成果的。

會議就要結束了，我們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希望大家保持經常的聯繫。我想，我們得感謝全國政協、湖北省委、黃岡地區的各級領導，特別是感謝為我們大家辛勤勞動搞會務的同志們，感謝赤壁賓館領導和服務員同志們對我們會議的支持和幫助。最後祝同志們朋友們旅途順風，祝同志們在即將到來的一九八六年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績。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黃州

（原載《玄圃論學集》，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〇年二月版。）

綜論現代中國新儒家哲學的 界定與評價問題

成中英

在現代中國對先秦及宋明儒家哲學有彰明倡導之功的應推新儒家。我們稱新儒家是相對現代中國以前的舊儒家而言。新儒家應是感受了印度、西洋文化與印度、西洋哲學的沖擊，而欲在現代化的世界上與現代人的生活中重建與重振儒家哲學。此一哲學尚包含儒家的本體哲學、心性哲學與道德哲學。在一個理想性的意義下，新儒家即是現代化的儒家，亦即能基於儒家哲學反省及綜合現代人的經驗知識與價值，提出現代人的理性思考系統。開拓現代人的精神境界，並進而能對中、印、西不同的哲學深入批評，擷長去短，達到折中於儒家思想體系的目的。就此一理想性的意義觀之，吾人可界定新儒家哲學應符合的條件如下：

(一)能夠掌握儒家哲學體系及源流，決不閉關自守，反能推陳出新；

(二) 能夠體認儒家哲學的智慧與精神，並能求力行實踐；

(三) 能夠發揮知解與分析的理性，在邏輯論證上思辯無礙，在觀念建構上清晰明白；

(四) 能夠面對現代人的知識、意志與行為等問題提出解釋與解決之道；

(五) 能夠把儒家哲學與其它中、印、西哲學體系深入比較，發揮“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果；

(六) 能夠融和諸家之說，為儒家哲學開闢新天地。

上述六個條件也可說代表了六個思想步驟：第一個條件是“先立其大者”的心態問題。新儒家如果不具有開放的胸襟，則如何能展現生機，成其廣大高明？第二個條件是善於認知體會深度問題，也是有着新儒家的修養及功夫的問題；如果新儒家對儒家思想的體認不深，修養不足，他又如何能“本立而道生”？第三個條件則是有着理性思考的訓練。哲學重理性思考、邏輯推論；若與人溝通，說服他人，必須假借理性的知解與邏輯的分析，故新儒家不能不重視此點。第四個條件關係到新儒家哲學對現代生活和科技知識的回應與適用，也可說是就現代生活的考驗與科技知識的挑戰提出要求。儒家哲學既為知行並重之學，則對其哲學的應用性自不可不加留意。第五個條件則代表了另一重考驗與挑戰！吾人可名之“世界化的考驗與挑戰”：新儒家必須要能在理論基礎上折衷百家，擴大其思考範圍及觀照對象，在中西文化交

流的今日，旁通西洋哲學，隨時切磋改錯，自是必要。最後的第六個條件說明新儒家必須要能發揮綜合融貫的精神，方是以創造體系，開導後繼者。

綜觀五四時代西學沖擊以來，從事新儒家哲學之創造最有成就者無疑要推熊十力先生，也唯有熊十力先生最為符合上述六項理想性的新儒家的界定條件。而事實上，熊氏也確為現代中國創導及發揮中國儒家哲學最有創見及最具影響力者。熊氏的哲學，博大宏深，自成體系。他的哲學是深造於大乘佛教及《易經》哲學的結晶。他解悟佛學大乘之弊，乃反歸於《易》道之生生思想。這有賴於宋明理學之承受佛道影響而歸本於儒家《易》學。但他較諸宋明諸家更能正用佛釋，吸收其精華，但在根源上卻認同儒家，積極地開創了一個以儒家思想為宗的哲學網絡。他的思想，據他所言，實立足於他自己對真實本體的“體證”，而此“體證”顯然則由承受《易經》哲學的啓示而來。吾人可說熊氏對佛學的批評實得力於他對《易》學的把握。當然，吾人也可看出他對佛學的精研，入乎其中而出乎其外，方能造就他對《易》學的肯認。因之，熊氏思想的發展實乃呈現了一個辯證的過程。這也是任何一個創新的哲學思想所必要的。更有進者，熊氏對本體真實的“體證”並未造成他對知解說明、邏輯分析的忽視。因而，他是能開拓出一個相當完整的本體宇宙哲學也並非偶然。本文將就其哲學思想的重點作一分析與評估，並期以反省其作為一個新儒家哲學的